

文匯講堂

传播人文关怀 汇聚高端名流 讲得通俗易懂 堂中尽情交流

2016年10月23日 总第105期 2016年第9期

报名、话题网页：<http://www.whb.cn/zhuzhan/jiangtang/>

公告栏

●扫一扫加入“汤因比专场”
讲座微信交流群



●讲座前十天开通网络实名制报名,相关信息请关注
<http://www.whb.cn/zhuzhan/jiangtang/>, 点击“我要报名”按钮索票。

●文汇报微信公众号: wenhuijiangtang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文汇报”, 演讲内容原声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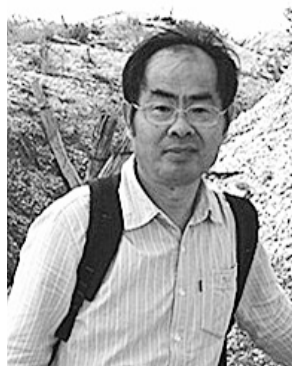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汤因比



郭小凌
主讲嘉宾

首都博物馆馆长,兼任国家社科基金世界史评审组成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历史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等职。197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同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史系就读,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之后任教于北师大历史系,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和西方史学史,出版或发表过《西方史学史》、《历史研究》、《古代世界的奴隶制与近现代人的诠释》等著作、译著、编著及论文、评论百余篇(本)。



对话嘉宾 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欧洲近现代思想史和社会史。主编“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等,出版有《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等。



对话嘉宾 陈恒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史学史》首席专家、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委员。

研究领域为西方史学史、西方城市史。

了解汤因比的六部著作

汤因比生于1889年,卒于1975年。曾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教授。

汤因比是世界文明研究的巨擘,他因写出“自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来最具启发性的历史理论”而被盛赞。

作为文明形态史观的典型代表,汤因比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的单位,以人的生老病死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他既用哲人的独特眼光,从宏观的角度对人类历史与文明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又以超凡的叙事才能,以历史学家的视野对人类历史与文明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汤因比著作集囊括了汤因比最有代表性的六部著作,分别是《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文明经受考验》、《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从东方到西方:汤因比环球游记》,从中可以完整了解汤因比的史学思想以及他对内容广泛的史学领域的探讨。

【专家评论】

“不论世人对汤因比的理论反映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思想照亮了庞大的历史。而且以若干理论、事实以及同代伟大诗人的直觉,支撑了整个历史。” ——《二十世纪代表性人物》

“他像罗素、施威则尔、爱因斯坦一样,是一位国际性的智者。” ——《时代周刊》

“汤因比在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时代的了解方面,给了我们以20世纪一个历史学家所作的最有意义的贡献。” ——《纽约先驱论坛报》

“汤氏的理论可医治人类心灵上的危机。” ——《朝日新闻》

“他的作品的规模之宏伟,堪与前人的天才作品媲美。” ——英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伯特兰·罗素

“史学家汤因比虽然已经驾鹤西归,但汤因比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美籍华裔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

“宏大的视野、渊博的学识、杰出的哲思、热情的文字和深沉的关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贡献了20世纪最睿智的思想果实之一。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他的智慧和关切依然会让我们掩卷深思。”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

“汤因比的不少著作其实是在谈生活哲理,通过文明的故事娓娓道来,能让读者在感受大历史万千气象的同时,领悟某些写人生的真谛。”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范晶提供)

对国家和文明兴衰的追问

为何庞大的帝国或文明会衰败,边缘地点的部落会兴盛?历史不胜枚举。这几乎迷住了每一位历史学家,随后,经济学家也加入。大家都想解开兴衰之谜。这里介绍几类解读。

汤因比:历史的研究单位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文明或社会

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汤因比认为,历史的研究单位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文明或社会。在他的被誉为继马克思《资本论》之后提出了最具有启发性历史理论的著作《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指出,英国本身不能构成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他将整个世界按不同时期和地理位置分割成21个文明或“文明社会”,其中包括了古代中国社会和主要以中国文明构成的所谓的“远东社会”,然后关注每个文明的成长、停滞和衰落。

汤因比认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系和灵魂的分裂。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用了极为简洁但又富有启发性和解释力的模型,即“挑战和应战”的历史模型。可以表述为:人类所以可能创造文明并不是由于它所拥有的生物天赋和地理环境,而是由于人类对于某种特别困难的挑战进行了应战。成功的应战的结局就是文明的诞生与生长。文明的衰弱,终极原因只有一个,该社会应战能力或创造力量丧失殆尽。

李约瑟:社会结构导致产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非中国

同样是英国人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有著名的“李约瑟之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明清中国而是西方。李约瑟坚决否认地理决定论和人种决定论,认为要到不同的文明结构中、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去找寻答案。所以在欧洲取得突破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遍及欧洲的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即欧洲的贵族封建主义及伴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来的商业资本主义和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而中国具有浓厚的文官制度,信仰“村民-君主”社会的不干预主义等,即社会结构在科技革命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东方世界的相对衰落由此开始了。

保罗·肯尼迪:国家兴衰在于“经济增长”不同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撰写了《大国的兴衰》,他把重点放在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军事冲突之上。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平衡以及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突破造成了优势不同。比如,蒸汽动力的发展,能建立先进的银行和信贷系统的国家就占优势。而一旦生产能力增加了,就需要对财富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军事的基础也得以巩固。肯尼迪将国家兴衰的原因说明转到了经济增长或停滞的原因分析了,“正是经济的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学术自由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创造出了“欧洲奇迹”。他同时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约瑟夫·熊彼特:创新才使得组织有了发展

有些学者不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察国家兴衰。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执行新的组合,即创新才能有发展,包括五种情况:开发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或控制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实现新的工业组织。新的组织的实现被熊彼特称为“企业”而为数不多的企业家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源泉。

汤因比可以说是在方法论集体主义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人之一了,所谓方法论集体主义,是指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文明是一种典型的群体,但是,国家、企业、社团同样也是团体,汤因比在以文明为单位进行应战时,他对个人的选择或行为同样不够。而保罗·肯尼迪的分析则是以国家为单位,群体的多样性体现出来了。而李约瑟的讨论中用到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之间是相互补充的。

在承认挑战——应战模型是分析集体行动基础模型的前提下,我们就要研究应战群体的多层多元性,接着必须讨论应战的手段或途径。因此,国家的兴衰问题的解释,至少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所给出的解释要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所给出的解释应该具有终极性,第三,所给出的解释原则上讲是可以检验的。第一点可以解释为应该有个公分母。所以,最具有应战性的,最能够体现出人类智慧的应战手段应该是制度的确立与改进。换言之,制度既是人类应战的结果,同时又是能否成功地迎接进一步挑战的先决条件。毋庸置疑,可以把文明看成是各种规则和习惯组成的制度。因此,制度在国家兴衰中的作用就非常值得研究。

(李念改编自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